

民国内蒙古东部牲畜棚圈的搭建及利用

张 博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作为协助牲畜抵御草原寒潮的利器,棚圈既是牲畜的生活空间,更是人类的生产空间,其搭建与利用不仅反映了农牧民对于家畜环境与牲畜空间的管理,而且也体现了畜牧生产模式与牧区社会的发展变迁。民国时期,内蒙古东部逐渐形成了农业区、农牧混合区以及纯牧区的多元经济地域,在此社会背景下,广大畜牧生产区的棚圈搭建数量逐渐增多,且不同地域在棚圈的选址、搭建、利用管理上也逐渐探索出了适应当地畜牧生产环境的多样模式,其中部分地区牲畜棚圈的建造与管理更融入了内地农区畜圈搭建的理念与技术,既反映出人、畜与草原环境的多元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内蒙古传统畜牧生产模式与牧区社会的新变迁。

【关键词】内蒙古东部;牲畜棚圈;家畜环境;民国时期;历史地理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1-0095-14

Establishment of Livestock Sheds and Livestock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Bo

(History School,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Abstract: As a sharp weapon to help livestock resist the cold wave on the grassland, the shed is not only the living space of livestock, but also the production space of human beings. Its 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not only reflect the management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on the livestock environment and livestock space, but also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livestock production mode and pastoral socie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eastern part of Inner Mongolia gradually formed a diversified economic region of agricultural areas, mixed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areas and pure pastoral areas. Under this social background, the number of sheds in the vast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are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different regions gradually explored a variety of models to adapt to the local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location, construction,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heds.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livestock sheds in some areas are mor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cept and technology of livestock sheds in inland agricultural areas,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multipl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livestock and grassland environment, but also reflects the new changes of traditional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mode and pastoral society in Inner Mongolia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Eastern Inner Mongolia; livestock shed circle; livestock environment;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historical geography

[收稿日期] 2023-02-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内蒙古地区畜牧生产变革的环境史研究(1840—1958)”(23CZS065)

[作者简介] 张博(1993—),男,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环境史。

牲畜棚圈具有牲畜生存空间与人类畜牧生产空间的双重属性,其选址、布局、搭建、管理等方面的变迁,不仅体现出人类对于家畜环境^①的干预与管理,更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畜牧经济与牧区社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牲畜棚圈的功用不局限于拘禁牲畜,其在防寒、防野兽、防疫、仔畜保育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此,对于牧区牲畜棚圈形态的认知,我们不能拘泥于内地农区式的封闭棚圈,而应该注意棚圈因时因地的多样性,其或是四周封闭且无顶棚的圈,或是半开放的围栏及防风墙,或是勒勒车围成的封闭空间,或是蒙古包内专供仔畜保育的围栏,或是内地那样四周封闭有顶棚或半顶棚的圈等。牲畜棚圈不仅仅是家畜生产生活空间与畜牧生产工具,其也蕴含着当地自然、文化、社会、技术等多元影响因素,是观察农牧区社会经济变化发展以及人、草、畜三者在草原生态系统中互动关系的重要视角,值得深入研究。

史学界目前对于人类居住空间,诸如城市、住宅、园林等的布局、结构、社会文化内涵、政治经济意义等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牲畜居住空间,同时也是人类重要生产空间的棚圈却相对被冷落。多数学者对于牲畜棚圈往往只关注其是牲畜的生活空间,强调动物性,而相对忽视了牲畜棚圈其实也有着浓厚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等色彩。牲畜棚圈是人类主导建造和管理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居住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牲畜的住所,同时也是人类的建筑。我国史学界的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历史时期的牲畜棚圈,一方面从技术史的角度着重分析牲畜棚圈的搭建技术演进,进而展现畜牧生产技术的发展^②。另一方面则从经济史、社会史的角度,将牲畜棚圈视为定居农业畜牧生产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其搭建范围扩展等进行分析,研究农牧互动、牧区社会变迁等问题^③。在西方学界,相关学者则从不同环境下(如城市、牧区、农场)牲畜棚圈的搭建、利用以及环境与社会影响等入手,对诸如现代城市建设、动物伦理、殖民扩张、畜牧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④。

虽然史学界在牲畜棚圈方面有了一定的研究,但仍有较大的深入空间。首先,目前关于历史时期牲畜棚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地农业区,对于以畜牧生产为中心的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牲畜棚圈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第二,目前关于内蒙古牲畜棚圈发展的研究多侧重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且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而对于晚清、民国时期内蒙古棚圈的具体模式、修建情况,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牲畜生产空间管理、畜牧生产模式变革等关注较少。第三,相关研究对边疆地区牲畜棚圈选址、搭建、管理持均质化视

① 家畜环境指“环绕于家畜生产与居住空间周围的各种客观条件的总和”。其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生物环境(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非生物环境(光、热、空气、水、土壤……)等分类,在畜牧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参见廖新梯、陈玉林主编:《家畜生态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

② 代表性研究有:谢成侠编著:《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修订版)》,农业出版社,1991年;徐旺生编著:《中国养猪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张扬、张法瑞:《清代京城牛羊圈述论》,《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李超、范允明、卢颖、关琳:《试论秦汉时期的养猪理念——以西安博物院入藏的一件汉代釉陶猪圈为例》,《农业考古》2017年第6期。等等。

③ 代表性研究有:王建革:《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乌日陶克套胡:《内蒙古自治区牧区经济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仁钦:《内蒙古牧区工作成就启示研究(1947-19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张博:《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搭棚盖圈运动与牧区社会经济建设》,《社会史研究》(第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④ 参见 Virginia DeJohn Anderson, *Animals into the Wilderness: The Development of Livestock Husbandr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59, No.2(2002). Dolly Jørgensen, *Running Amuck? Urban Swine Management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87, No.4(2013). Thomas Webb, *The Pigs are Back Again: Urban Pig Keeping in Wartime Britain, 1939-45*, in Sharon Wilcox and Stephanie Rutherford, eds., *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 Routledge, 2018. Sean Kheraj, *Urban Environments and the Animal Nuisance: Domestic Livestock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adian Cities*, *Urban History Review*, Vol.44, No.1/2(2015). Peter Atkins edited, *Animal Cities: Beastly Urban Histories*. Routledge, 2016.

角,对其因地制宜的多元性关注相对不足。本文将以民国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牲畜棚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农区、农牧混合区、纯牧区多元环境下牲畜棚圈的选址与布局、棚圈结构与建材、棚圈空间利用与管理等进行分析,揭示农牧民在畜牧生产中对于家畜环境的干预与管理,进而对其背后所反映的近代畜牧生产变革展开研究。

一、内蒙古畜牧生产气候条件与棚圈利用的必要性

气候对于游牧生产的影响至关重要,即使变化烈度没有达到灾害的程度,但只要出现微弱的变动就可极大地影响牧草的产量与质量、牲畜的状态与结构,以及农牧民的迁徙频率与速度等。游牧经济包含草原生态系统的两层生产,“草原—牧草”是第一性生产,在种草打草尚未推广的时期,牧民对于牧草生产影响较弱,一般靠自然之力完成。而在这一过程中,气温与降水直接决定着牧草的质量,使其总体呈现“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①的周期性,直接影响了牲畜的生长繁殖。“牲畜—畜产品”为草原生态系统的第二性生产,其中虽然较多受到牧民劳动因素的影响,但牲畜的自然生长繁殖始终是其重要基础。不同畜种有着不同的气候适应能力,气温、降水等气候因素的波动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不同牲畜的生长繁殖状态,进而对畜牧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如在温度方面,牲畜在超过自己适应范围的高温时期,采食量会大大下降,“这不仅是由于动物增加了寻找荫凉的活动,也是由于食欲减退了。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排泄行为的变更和生产性能的全面下降”^②等。

气候条件对于畜牧生产至关重要,但内蒙古地区的大陆性气候亦具有不稳定性与多变性特征,因而给农牧民的畜牧生产带来较大的威胁。对于蒙古高原的气候环境,以中原农耕文明视角为主的汉籍史料中,往往强调因纬度地带性差异而带来的气温降低,这就使寒冷成为历史文献中游牧世界的典型特征,如柔然地区“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③;马洛侯室韦所居地区“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④,以至“马溺至地成冰堆”^⑤等,荒寒更成为气候恶劣乃至“非人境”^⑥的表现。但对于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动植物及人类来说,寒冷干燥的气候是其能够适应的,此地亦是乐土与家园。因此,游牧生产不稳定性不完全在于气候环境的寒或旱,而在于气候的复杂多变,加剧了牧业生产气候的不确定性。宋人彭大雅称蒙地:“无四时八节,四月八月常雪,风色稍变,近而居庸关,北如官山金莲川等处,虽六月亦雪。”^⑦13世纪教会使节加宾尼出使蒙古时称:“那里的天气是惊人地不合常规”^⑧,鲁不鲁乞在随蒙哥汗转场时,“在途中经过多山的地区,那里刮着猛烈的风,下着大雪,天气严寒,”^⑨威胁牲畜产仔;明代鞑靼部“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⑩等均体现了突发性寒潮变化给游牧生产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值得注意的是,寒潮除部分直接伤及人畜外,大部分是通过破坏牧草,间接使牲畜倒毙、牧人饥亡。因而对于牧民来说,作用于牧草与牲畜的灾害亦是人类的灾害。此不仅可以反映出人、草、畜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更体现出游牧

① [南宋]彭大雅著,徐霆疏证:《黑鞑事略》,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页。

② [加]A.F.弗雷泽:《家畜行为学》,《家畜行为学》翻译组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③ [唐]姚思廉:《梁书》卷54《芮芮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817页。

④ [北齐]魏收:《魏书》卷100《乌洛侯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4页。

⑤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73《四夷附录》,中华书局,1974年,第907页。

⑥ [后晋]胡峤:《陷辽记》,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38页。

⑦ [南宋]彭大雅著,徐霆疏证:《黑鞑事略》,第2页。

⑧ [意]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页。

⑨ [法]鲁不鲁乞:《鲁不鲁乞东游记》,[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第195-196页。

⑩ [明]杨荣:《北征记》,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生产虽多被视为一种经济行为,但仍是草原生态网络中的一环,其不稳定性不仅是一种经济表现,更是生态网络中各要素彼此联系的反映。

蒙古草原地区气候多变,在寻常年份,牲畜可在牧民的驱赶下,至背风及相对温暖处采食枯草维生。但蒙古高原时有暴风雪灾害发生(牧民称为“白灾”或“Dzud”),如呼伦贝尔地区“约每五年遭遇一次大的寒冷和积雪”^①,在此年景下,极端的风雪与低温天气会直接伤害牲畜本体,使其冻毙或染疾,“无论具如何强健本质之蒙古羊,冻死者仍居多数”^②;或者过量的积雪也会深埋有限的枯草,使得侥幸逃过寒冷的牲畜饿毙;亦或者低温使得在这一时期新生的仔畜夭折,影响整个牧群的繁殖更新等。暴风雪的突发性与巨大的破坏性使蒙古高原广大牧民将暴风雪视为“危害人类的东方腾格里降给人们的灾难”^③,是难以逃脱的天灾,具有悲观的宿命感。民国时期,暴风雪及低温灾害依旧是内蒙古农牧区畜牧生产的巨大威胁,牧民仅通过游动转场以及凭借牲畜自身抵抗力很难躲过大范围暴风雪的袭击。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如呼伦贝尔草原一带,1908年4月,“忽降大雪,厚至三四尺,各蒙旗牲畜多为冻毙”^④;1928年冬“蒙地风雪成灾,羊只倒毙颇多,影响所及,不仅羊毛产额,遽形减少,即毛之成色,亦较往年为劣”^⑤。又如巴林草原一带,“民国三年(1914)冬天的大雪,冻死牲畜近万头”^⑥。再如锡林郭勒草原一带,1936年的调查中,牲畜死亡率较高,其中多为暴风雪中冻饿而死^⑦,特别是西苏尼特旗一带暴风雪带来的灾害更使84%的牲畜倒毙(见表1)。

表1 1936年西苏尼特旗雪害灾情

项目	羊	牛	马	驼	总计
原有牲畜	1900	492	70	25	2578
倒毙数	1670	409	10	5	2092
毙死率	87%	82%	14%	20%	84%

资料来源:興亜院政務部内閣官房総務課:《蒙疆牧業狀況調査》(1941年11月),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6033010900。

暴风雪及低温灾害给蒙地广大农牧区的牧业生产带来巨大打击,使其被视为牧区经济以及畜牧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公敌”之一,引起政府及学界的广泛关注。如学者顾谦吉、俞保权通过研究指出,暴风雪带来的寒冷气候及掩埋枯草的大量积雪,是西北地区绵羊倒毙的主凶^⑧。严躬在分析呼伦贝尔牲畜死亡率高的原因时,将“冬令雪大、天气严寒”^⑨放在前两位。张范村和赵松森也指出:“雪量可以支配蒙古

① 南满洲鐵道鐵道總局:《呼倫貝爾畜產事情》,南满洲鐵道鐵道總局,1938年,第38页。

② 《农商部渔牧司撰东蒙古之畜牧业稿》(191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农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36页。

③ [苏]И·А·曼日格耶夫:《布里亚特萨满教和前萨满教辞典》,满都尔图、周锡银、佟德富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蒙古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38页。

④ [清]宋小濂:《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清]宋小濂著、蒙秉书等编注:《宋小濂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⑤ 《民国十七年海拉尔之商况》,《东省经济月刊》1929年第5卷第1期。

⑥ 韩士龙:《清末民初巴林右旗畜牧业的经营和商品生产交易略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林右旗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91年,第240页。

⑦ 参见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特别调查第一班报告书(畜产编)》(1936年1月),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⑧ 顾谦吉、俞保权:《西北绵羊冬季大量倒毙原因的研究》,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1942年,第15页。

⑨ 严躬:《东蒙呼伦贝尔地方之贸易状况》,《东省经济月刊》1926年第2卷第12期。

农业及家畜之命运。”^①刘熙指出天灾为蒙地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其中“霜雪为害最烈,野火次之,旱灾又次之”^②等。部分外国学者也有类似认识,如日本学者西藤辰雄在考察了察哈尔地区后指出:雪害、病疫、狼害是牧业发展的三大威胁^③;苏联学者迈斯基也将“寒冷”“吹雪”列入畜牧生产的“世仇”之中^④。民国时期,为加强对内蒙古地区的管理与开发,构建现代化畜牧经济,支援国家建设,暴风雪及低温灾害成为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难题,而搭棚盖圈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提倡,并开始在内蒙古部分农牧区推行。农牧民也开始通过棚圈搭建加大对家畜环境的干预,以协助各类牲畜抵御严寒,生长繁殖。

二、内蒙古东部农区、农牧混合区棚圈搭建与利用

作为牲畜的生活空间与人类重要的畜牧生产空间,农牧民在进行棚圈的选址与搭建时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同时顺应牲畜习性与民众生活之便。在农业区和农牧混合区(包括大兴安岭以南及旧昭乌达、哲里木盟南部地区,多已聚集大量汉民,并设县管理,呈蒙汉杂居状态,经济上多以农业及农牧兼营为主),虽然民众多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其仍经营着相当规模的畜牧生产,这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极为普遍。如哲里木盟扎萨克图旗有朱姓汉人家庭,除经营客店,并种地数十晌外,还牧养牛羊百余头^⑤,又如喀喇沁旗一带的汉人辛万荣“种地三十余顷,牛马五十余头,在本地亦称富豪之户也”^⑥。除汉民外,这一地带的部分蒙民在转向从事农耕的同时,仍然保有一定量的牲畜饲养。如达尔罕旗蒙古台蒙人郭景祥在耕种之余也饲养牛3头、马3匹、驴2头、绵羊29只、猪8头、鸡10只,以及受托羊76只;同旗后乃木格拉蒙人李向春除耕作外,饲养牛1头、马1匹、骡1头、驴4头、猪2头、鸡4只,以及受托羊77只^⑦等。由于人户众多,若以总量计之,部分地域农业区和农牧混合区的畜产总量甚至超过纯牧区,因而我们不能忽视其在内蒙古牧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农业区及农牧混合区,多采用放牧与舍饲结合的方式,棚圈是其必备的生产用具,各地民众总是根据具体环境与牲畜饲养情况进行搭建。

(一)棚圈选址布局

在选址、布局方面,农业区、农牧混合区的牲畜棚圈多修建于住宅附近,遵从着《齐民要术》中“圈不厌近。必须与人居相连,开窗向圈”^⑧的古训。在内蒙古东南部哲里木和昭乌达盟的蒙古农牧定居地区,部分农牧民选择将畜圈修在院中,四面皆有材料各异的围墙。如通辽县满族农人徐祥在其宅院中建造土坯羊圈,畜墙高四尺,圈长约五间,宽三间(关东间,1间=6尺=1.818米;关西间,1间=6尺5寸=1.944米)^⑨。达尔罕旗乌里毛顺嘎查蒙古族农民王德福也选择将畜圈建在院中,用苇子和榆树枝围成(面积约20

① 张范村、赵松森:《蒙古农林事业之研究》,《建设》1931年第12期。

② 刘熙:《蒙古牧业之研究》,《蒙藏月报》1936年第5卷第2-3期。

③ 参见[日]西藤辰雄:《内蒙察哈尔事情》,满洲弘报协会,1937年。

④ [苏]迈斯基:《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汉昭译,纳吉单夫审校、整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二辑),内部资料,1988年,第218页。

⑤ 佚名:《督办赴洮南新城齐齐哈尔沿途日记》(光绪三十四年),李澍田主编:《蒙荒案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8页。

⑥ 汪国钧:《蒙古纪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

⑦ 参见[日]鸣神忠男:《寄存绵羊一般情况调查报告(关于绵羊的调查资料之一)》,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2、149页。

⑧ [北魏]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553页。

⑨ [日]鸣神忠男:《寄存绵羊一般情况调查报告(关于绵羊的调查资料之一)》,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6册),第131页。

坪),不借用墙壁。对于羔羊和孕羊,为保其温暖,另用苇子围建畜圈,圈壁高可达7尺左右^①。部分农牧民选择将畜圈建在院中一隅,依靠和利用部分屋壁和院墙,如通辽满族农民张平珠、李生均将畜圈建于院中东南隅,皆为土坯制,畜墙均高四尺^②。达尔罕旗后乃木格拉嘎查蒙古农民张吉永将畜圈建于院中西南隅,依靠和借用一面院墙,宽三间、长二十五间;同旗彰古台嘎查蒙古农民郭景祥也将畜圈建于院中西南隅,但其三侧依靠和利用了房屋墙壁和院墙^③等。此外,部分农牧民还将畜圈建在院外,有的会利用院墙搭建,有的则另造畜墙,与院子间隔一段距离。如达尔罕旗陇路特嘎查一带蒙古农民白温乡则将畜圈建于院外,材料为柳条,长二十六间,宽三间^④。此外,部分农牧民还建造多个畜圈,如达尔罕旗瓜里毛顺嘎查蒙古人藤海山家中建有两个畜圈,一个为土制,位于院东南隅,依靠和利用一面院墙;另一个则位于院外,用苇子和榆树枝围成^⑤。

以上是内蒙古东部农区和农牧混合区畜圈具有代表性的选址和布局模式,其总体特征一方面是固定性与持久性,另一方面又与当地农牧民的住所密切结合。无论在院内还是院外,在修建过程中,大部分畜圈多会利用一面至三面已有的屋壁或院墙,形成人畜共用墙壁。此种选址和布局第一可以保障牲畜的安全,特别是在防寒方面,院墙和屋壁一般较厚,可以为牲畜形成一堵防风墙,保暖效果远超另外搭建的柳条或树枝圈。由于靠近屋宅,在防狼和防盗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第二,此种选址布局便利农牧民进行相关牧事活动。由于农区及农牧混合区的畜牧生产为放牧与舍饲的结合,诸如剪毛、挤奶、保育等多在圈内进行^⑥,因而此种布局便于民众在忙碌的农业生产之余兼顾畜牧生产。第三,利用已有房屋和院墙可以大大减少牲畜棚圈的搭建成本。以科尔沁左翼中旗的马圈为例,一个新建的房屋式马棚需花费40元,而利用院墙或屋壁的依附差挂式马棚仅需19元20钱,采用柳条或榆树枝搭建的马圈所用更少,仅需5元50钱,但其耐久性和保暖性则无法与前两种相比^⑦。故相较之下,依靠已有屋、院墙盖圈的性价比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部分农业区及农牧混合区的畜圈选址与布局也因畜种而有所差异。如有两个圈的农牧民,往往将院内的棚圈用来收容马、牛、骡等大牲畜,部分地区甚至在圈内建有顶棚和固定饲槽,而院外较为简易的棚圈则收容绵羊等^⑧。在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的三河地区,该地有大量俄国侨民及多民族的农牧业生产者,其生产用地的分配具有圈层结构特征,住宅圈外为放牧地圈,放牧地圈外为耕种地圈,每圈宽5~15千米不等^⑨,因而其牲畜棚圈的分布也具有明确的分区、分段特征(如图1、2)。

① [日]鸣神忠男:《寄存绵羊一般情况调查报告(关于绵羊的调查资料之一)》,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6册),第169页。

② [日]鸣神忠男:《寄存绵羊一般情况调查报告(关于绵羊的调查资料之一)》,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6册),第136、140页。

③ [日]鸣神忠男:《寄存绵羊一般情况调查报告(关于绵羊的调查资料之一)》,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6册),第148、164页。

④ [日]鸣神忠男:《寄存绵羊一般情况调查报告(关于绵羊的调查资料之一)》,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6册),第144页。

⑤ [日]鸣神忠男:《寄存绵羊一般情况调查报告(关于绵羊的调查资料之一)》,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6册),第174页。

⑥ 花楞:《内蒙古纪要》,1916年铅印本,第91-92页。

⑦ 满铁产业部:《科尔沁左翼中旗第六区调查报告》,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3页。

⑧ 满铁产业部:《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区调查报告》,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2册),第102-104页。满铁产业部:《寄存绵羊饲养经济调查》,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6册),第205页。

⑨ 满铁调查部:《兴安北省、兴安东省、滨江省及龙江省役畜资源调查报告》,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8册),第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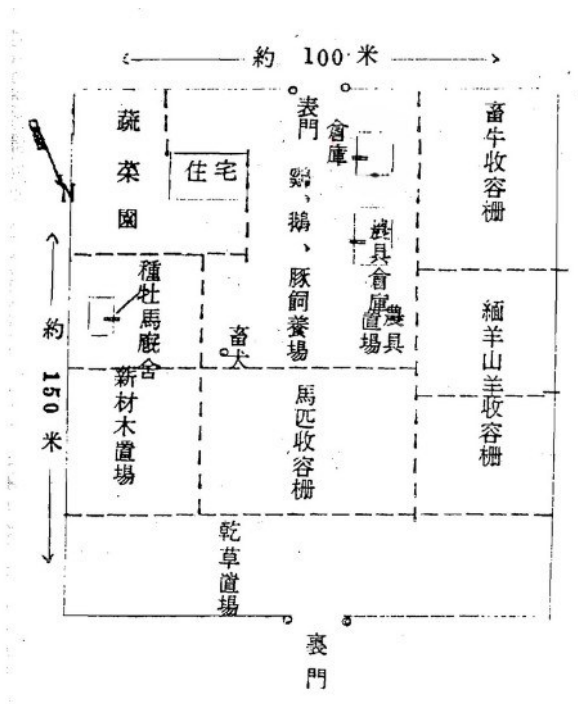


图1 20世纪30年代三河地区某户庭院布局

图片来源:满铁调查部:《兴安北省、兴安东省、滨江省及龙江省役畜资源调查报告》(1939年6月),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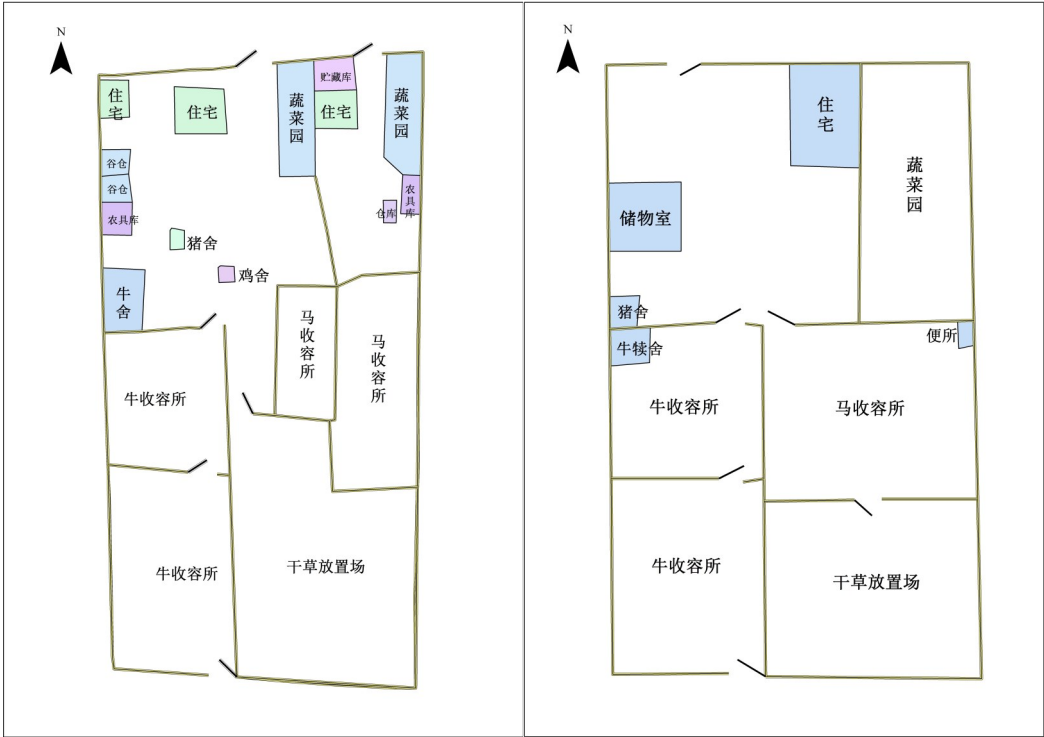


图2 20世纪40年代三河地区某两户庭院布局

底图来源: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局編:《興安北省三河地方に於ける畜産並牧野事情》,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42年。

从图1、2中我们可以发现,三河地区部分农牧民庭院面积较大,分区明晰,住宅往往和蔬菜区相邻,不与棚圈相接,猪、鸡等小畜禽棚舍散布在院中,其他牲畜棚圈则集中分布在周边,错落有致,各有分区、墙围及门户,且与干草储备地接近,便于牲畜饲喂,总体上可以看出明确的居住区与畜牧生产区。诸如牛、马等畜既有棚舍,又有露天的收容所,部分地区还有为牛犊专设的棚圈,可见其牧业生产的细致,具有一定的专业化与集约化。

(二)棚圈材料及构造

畜圈的建材多样。首先,柳条、树枝(主要有杨树、榆树、桦树等)、苇子、木栅等植物性材料是常见的畜圈建材。如内蒙古东南地区昭乌达盟西拉木伦河一带“其间住民,已脱游牧之习,住宅有一定之所在,其饲养家畜之法,即在住屋院内,或编柳条为栅,或筑土壁,曰马圈子”^①。翁牛特旗一带民众也“用柳树枝做牛羊圈来圈牛羊”^②。阿鲁科尔沁旗、扎鲁特旗一带畜圈亦主要以树枝、柳条等编成,较为简陋^③,部分地区甚至仅“以短木断枝作一栅栏”^④。在赤峰等城市中也因市场需求而出现部分修盖畜圈的木工,甚至不乏日本木工,如斋藤满男及其叔、兄曾在赤峰及其周边经营羊圈改造的木工工作,用呼伦贝尔以及东北地区的木材来进行修建^⑤。又如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三河地区,这里有大量俄侨及各族农民,他们大多建有较为坚固的畜圈,其“畜舍多用河畔柳类、白桦之小树枝编造而成栅栏围成,有顶棚与运动场地。乳牛及仔牛之收容圈栅,宽三间,长七间”^⑥(1间=6尺=1.818米)。科尔沁草原地区的农牧交错区其民众在院外修建的羊舍也多为柳条、苇子或榆木编制^⑦,即使在院内修建利用一至三面屋壁或院墙的棚圈,其剩余的一边也建有木栅、柳栅或苇栅^⑧。在诸多建材中,上述植物性建材是较为便宜的,且多能够在当地自然获得,因而修建成本较低,如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修建一个可容纳80只羊的带有土墙的差挂式圈(即依靠房屋或院墙修建的土圈)需要43.3元,修建同样大小的榆木圈仅需15.4元,而同样大小的苇子圈花费更少,仅需7.7元^⑨,这对于羊只多,大牲畜少的农牧民极为实惠。除此之外,土坯、石头、砖块等也是内蒙古东部农区、农牧混合区农牧民重要的搭圈材料,这些建材筑造的畜圈在坚固性、耐久性及防寒性上均优于植物类建材,因而在定居程度较高的地区被较为广泛地利用,特别是在牛、马、骡等大牲畜棚圈的搭建上。其中,土坯由于便于寻找与搭建,因而更受农牧民青睐,如昭乌达盟及热河一带部分农牧区畜舍建有1.3~1.5米高之土墙^⑩。此外,牲畜棚圈因饲养需求、建造材料的不同而形成不同样式,

① 花楞:《内蒙古纪要》,第91页。

② [日]鸟居君子:《从土俗学上看蒙古》,赛音朝格图、娜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4-355页。

③ 関東都督府民政部:《滿蒙調査復命書 第拾壹》(1918年9月30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6033515100。

④ 《东三省以南内蒙古以东之牧羊业》(续),《新闻报》1922年12月9日,第14版。

⑤ [日]斋藤满男:《四十年代我在赤峰经营的土木建筑业》,王恩歧、贾荫生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赤峰市红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红山文史》(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⑥ 哈爾濱鐵路局北滿經濟調查所編:《興安北省三河地方農村豫察調查報告》,北滿經濟調查所,1936年,第95页。

⑦ 满铁产业部:《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区调查报告》,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104页。

⑧ [日]鸣神忠男:《寄存绵羊一般情况调查报告(关于绵羊的调查资料之一)》(1937年4月),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2册),第164页。

⑨ 满铁产业部:《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五区调查报告》,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3册),第67页。

⑩ 满铁调查部第一调查室畜产班:《兴安西省及热河省管辖范围内役畜资源现状调查》,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7册),第221页。

如存在顶棚、无顶棚、半顶棚,以及有舍有活动场、有舍无活动场、有场无舍等多种类别^①。其中有顶棚,且有活动场的圈在防寒性、坚固性上都较好,为理想的畜圈,但成本也相对较高,故数量有限。

(三)棚圈利用与管理

内蒙古东部农业区与农牧混合区坚持农牧兼营,因而在畜牧生产方面与纯牧区和内地农业区均有不同,其一方面坚持放牧,最大程度利用天然植物,另一方面,在农忙时期及冬春寒冷时节对部分牲畜进行舍饲,以保证其生产繁殖的营养所需。因此,畜圈在这一地区的集中利用并非全年性质的。如内蒙古东南的热河农牧兼营地区,马、牛在5—7月为役使期,进行耕作、除草等工作,因而在这一时期集中入圈舍饲,且喂有精饲料(如高粱、豆类)以加强营养,在农闲时节则多在附近放牧觅食,直至天寒食草困难时期再次入圈舍饲,通常一年中有6个月的舍饲期。羊则与牛马不同,大多数时间为放养状态,从10月至次年2月,天寒降雪,草被埋没时再入圈舍饲^②。又如在内蒙古北部呼伦贝尔的巴尔虎地区,部分农牧民也施行放牧与舍饲结合的方式,其中除羊外的多数牲畜在10月至次年4月集中入圈舍饲,羊则全年放牧^③。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在牲畜放养阶段也离不开棚圈,但棚圈使用也不是全天候的,一般牲畜早晨出去放牧,晚上归圈,如大兴安岭以南部分地区,牲畜在4—10月牧草相对较多时,昼间放牧,夜间入圈收容^④。科尔沁草原一带的农区与农牧兼营区在放牧季,牲畜也多是早上赶出,晚上赶回圈内,防狼防盗^⑤,阿鲁科尔沁、扎鲁特旗一带也是如此^⑥。甚至诸如猪这类移动性较差的牲畜也于白天放牧在外,晚上才归圈^⑦。

由上可知,相当部分民众对于已有畜圈的利用时间和频率是相对有限的,特别是对于数量较多,但移动性极强的山羊、绵羊,其一般只有简易的临时性的棚圈,甚至没有棚圈。因此,农牧民对于棚圈及其内环境的管理极为简单,部分地区民众甚至在圈内“不为之垫以铺地草”^⑧,在棚圈的卫生及清洁上也较差,如呼伦贝尔三河地区农牧民“关于家畜的卫生居民们完全不予理会,数十年来,家畜的粪便任其堆积在院子的栅栏里面,而牛马也喂养在栅栏里”^⑨。值得一提的是,棚圈在当地的生产中,不仅仅是一个牲畜居所,更可作为燃料、肥料等使用的畜粪的重要产地,这也是部分农牧民在畜圈的经营管理中极为重视的一个经营项目。对于这一地区农牧兼营的民众而言,畜粪是棚圈带来的巨大财富之一,其像在牧区一样多被用作燃料^⑩,后来,部分蒙古族农民也开始学习内地的生产技术,将畜粪主要用作肥料。以科尔

① 参见满铁产业部:《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区调查报告》(1937年4月),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2册),第102页。满铁产业部:《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五区调查报告》,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3册),2005年,第67页。哈爾濱鐵路局北滿經濟調查所編:《興安北省三河地方農村豫察調查報告》,北滿經濟調查所,1936年,第95页等。

② [日]木下壽男等:《承德、平泉ヲ中心トスル熱河喜峰口古北口ヲ起點トスル北支比較農業調查報告》,滿鐵經濟調查會,1934年,第82页。

③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庶務部調查課編:《巴尔虎(呼伦贝尔の经济概観)》,大阪毎日新聞社,1930年,第209页。

④ 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騎兵集團興安嶺調查報告》(1934年5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4021044700。

⑤ 满铁产业部:《科尔沁左翼中旗第六区调查报告》,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1册),第465页。

⑥ 関東都督府民政部:《滿蒙調查復命書 第拾壹》(1918年9月30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6033515100。

⑦ [日]木下壽男等:《承德、平泉ヲ中心トスル熱河喜峰口古北口ヲ起點トスル北支比較農業調查報告》,第83页。

⑧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興業部農務課編:《東省之農業》,滿洲日日新聞社印刷所,1927年,第56页。

⑨ [日]山崎維城:《兴安北分省三河地区调查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联合编译:《满铁调查》(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95页。

⑩ 据统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九区平均每户每年需牛粪3000斤作为燃料,扎鲁特、阿鲁科尔沁一带,即使生活贫困的下层家庭,每年也最少需用畜粪20车作为燃料。参见滿鐵調查部編:《興安西省札魯特旗阿爾科爾沁旗畜產調查報告》,滿鐵調查部,1938年。满铁产业部:《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九区调查报告书》,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沁左翼中旗第一区为例,衙门屯(共50户,356人,均系蒙古族)等嘎查将畜粪全部用作肥料;公主瓦房(共110户,共924人,均系蒙古族)、好得营子(共20户,131人,均系蒙古族)等嘎查将牛粪用作燃料,其他畜粪均用作肥料^①。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只是一部分蒙古农民以及移垦汉民的做法,这一时期在蒙地农业耕作中施用人畜粪等肥料的行为总体仍然较少。除此之外,畜粪可以直接换为货币或实物财物,如在科尔沁中旗第五区一带,东毛头营子(全村共160人,均为蒙古族)一大车牛粪值50~80钱(十月到次年五月中旬,一头牛约产牛粪三车),腰拉毛头(全村405人,均为蒙古族)一车牛粪值80钱^②,在赤峰市场上,一车畜粪多达2元2角^③。这对于部分农牧民来说是一笔较为可观的财富来源,如达尔罕旗乌里毛顺嘎查农民王德福(蒙古族)的70只羊年产粪量能为其带来10元收入等^④。因而在畜圈的管理中,部分民众将畜粪清理出来并堆积在圈周边地带,或将其直接贴在、垒在畜圈上晾干,之后将其用作燃料、肥料或直接出售,畜圈是牲畜生产空间,但同时也是农业粪肥的生产和加工“工场”,如花楞在兴安岭南部地区发现:家畜棚圈及其前面与侧面是重要的储粪地点,“积储牛粪,几如小丘”^⑤。王华隆也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现“圈棚外积蓄粪如小丘”^⑥等。

三、内蒙古东部纯牧区棚圈搭建与利用

内蒙古东部纯牧区(包括大兴安岭以西以北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大部,以及旧昭乌达、哲里木盟北部部分草原牧区,多为蒙民聚集、世袭扎萨克管理的蒙旗)长期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产,牧民根据牧草状况及牲畜习性较为频繁地进行转场放牧,在通过最快速度、最大空间位移躲避灾害的同时,顺应草原植被及牲畜习性,进行动态的牧业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牲畜棚圈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故游牧文明对于牲畜棚圈早就有相当的认识与利用。如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辞典》中有诸多关于牲畜棚圈的字词,如“aran”即畜圈,圈棚;“oZluk”即“畜圈里牛卧的地方”^⑦;“kasi”即“用树条编的把羊和其它东西圈起来的圈”^⑧等。在突厥文碑铭《苏吉碑》中记述9世纪游牧统治者之富足时称“我很富有的,我有畜圈十个,我的马匹无数”^⑨,可见其对于棚圈的利用。清代内蒙古地区利用棚圈的行为更多,在内蒙古东部,如呼伦贝尔草原牧民在游牧过程中常使用“纳古德勒音哈莎”,这是一种用柳条、桦木杨木等材料制作的可移动的简易畜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寒、防走失等^⑩。牧民对牲畜棚圈的利用在其词汇方面也有一定的反映,如《御制增订清文鉴》中有较多关于牲畜棚圈的满语词汇:牲口草棚(felhen)、棚(lem-pen)、马圈(heren)、猪窝(un)、猪羊圈(horho)等,且同一时期各满蒙文辞典也沿用了这些词语及相关释义,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游牧民对于棚圈的认识状况^⑪。

① 参见满铁产业部:《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区调查报告》,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2册),第418、426、230页。

② 参见满铁产业部:《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五区调查报告》,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3册),第120-121、148页。

③ 関東都督府民政部:《滿蒙調査復命書 第十》(1917年9月25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6033515000。

④ 满铁产业部:《寄存绵羊饲养经济调查》,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6册),第301页。

⑤ 花楞:《内蒙古纪要》,第38页。

⑥ 王华隆:《内蒙古人民之生活状况》,《华安》1920年第2卷第6期。

⑦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一卷),校仲彝等译,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⑧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三卷),第219页。

⑨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⑩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159页。

⑪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三十二《牲畜部二·牲畜器用类一》,[清]王际华、[清]于敏中编:《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乾隆年抄本,第22页。

(一)牲畜棚圈的选址与布局

游牧生产方式移动性强,因而牲畜全年放牧,夜晚则多栖息于毡帐周边的卧场,如大兴安岭东南部兴安部分牧区“无马厩、牛棚、羊圈之设备,亦无刍草之积蓄。牲畜皆就食于野,入暮即卧息于包侧”^①。又如大兴安岭西北呼伦贝尔草原部分牧区也“无畜舍,全年放牧。夜间家畜在蒙古包周边,通常牛与骆驼距包近,马距包稍远”^②。再如科尔沁草原部分牧区“家畜无棚舍,昼夜不圈,冬春季节露宿在背风的坨坑和树林内,称‘打野盘’;夏秋季节露宿在高岗或平坦的风凉处”^③。锡林郭勒草原一带更是“牧畜并无畜圈,一任牲畜在原野吃草,且不甚看管,夜间仍在草地”^④等。但畜圈在部分牧区的畜牧生产中仍然有一定的作用,被牧民所使用,蒙地大规模放垦后,内蒙古牧区的畜圈数量较之前有明显的增加。如阿鲁科尔沁旗50个佐“均有固定牧场,在生产技术和饲养管理,如打井、搭棚、筑圈和牧草的保护、固定冬夏营地等有了改进”^⑤。又如清中叶后科尔沁左翼中旗“牲畜饲养方式发生变化,当时已有了相当数量的贮草和简易的棚圈,遇到风雪将散放的家畜赶回棚圈”^⑥。再如游牧发达的锡林郭勒草原一带,部分牧民毡帐周边也有“用柳条简单编制的牧棚”^⑦,当地“专养羊者,每群大者,不过三百头,有牧场,有羊圈”^⑧等,即使在游牧程度更高的外蒙古部分牧区,“冬季寒风凛冽,牲畜在旷野中棲息不得了,便作一种小舍,四围用枯枝环绕起来,以为藩篱”^⑨。纯牧区牧民对于畜圈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御寒、防狼防盗、保育仔畜等方面,如在防寒和保育幼畜方面,翁牛特北部牧区“用牛车做圈来圈牛羊。接羔羊的时候,专门搭建一个帐篷,把羔羊放在里边。冬季极寒之际,妇女们把羊羔抱在怀里养育。如果产了牛犊,就在蒙古包旁做个小棚饲养”^⑩。部分牧区民众在幼畜出生后,也会专门建圈保护,“其由柳条编造而成,呈馒头形(内侧二三坪乃至四五坪),仔畜出生后置于此圈”^⑪。又如在防范野兽方面,部分“牧区有高丈余、圆形或方形畜棚,冬季或夜间圈羊,以防野兽”^⑫等。

纯牧区畜圈在选址和布局上在一些方面与农区、农牧混合区有一定相似性,如畜圈分布在住宅周边等。在没有棚圈的情况下,部分牧区牧民为了能够协助牲畜御寒,多将牲畜放在毡帐以及车辆的南部,“即以自己所住之帐,而为之御北风”^⑬,在修建棚圈后,部分地区仍然沿用此习惯,在利用棚圈挡风的同时,也利用毡帐等协助挡风,以保护牲畜。值得注意的是,纯牧区的畜圈被统称为“哈萨”,其不同于蒙地农区和农牧混合区畜圈,多不是固定的建筑,而是具有相当移动性、可以搬运迁移的工具,在材料和建造

① 关恩霖等编:《兴安屯垦第一年工作概况》,兴安区屯垦公署,1930年,第103页。

② 满铁调查部:《兴安北省、兴安东省、滨江省及龙江省役畜资源调查报告》,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8册),第92页。

③ 《科尔沁左翼中旗志》编纂委员会编:《科尔沁左翼中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88页。

④ 阙名:《察哈尔蒙族的现状》,《社会杂志》1931年第2卷第1/2期。

⑤ 《阿鲁科尔沁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阿鲁科尔沁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8页。

⑥ 《科尔沁左翼中旗志》编纂委员会编:《科尔沁左翼中旗志》,第488页。

⑦ 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黑龙江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第9册),第388页。

⑧ 宋哲元监修、梁建章总纂:《察哈尔通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565-566页。

⑨ 澄川:《外蒙古之土宜与物产》,《中东经济月刊》1930年第6卷第8期。

⑩ [日]鸟居君子:《从土俗学上看蒙古》,赛音朝格图、娜拉译,第354-355页。

⑪ 関東都督府民政部:《滿蒙調査復命書 第拾壹》(1918年9月30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6033515100。

⑫ 參謀本部:《東部内蒙古經濟事情住谷悌史資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4021119500。

⑬ 《农商部渔牧司撰东蒙古之畜牧业稿》(191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农商(一)》,第536页。

方面也相对简易,拆卸后可放在车上转移。如呼伦贝尔草原牧区的可移动畜圈被称为“纳古德勒音哈萨”,是牧民必备的生产工具,多以柳条等木制材料编成,“夏秋一般天气情况下羊群适宜散卧,如遇冷雨、雷雨、蚊蠓活动厉害的夜晚将羊群赶入哈萨内,可避免羊群惊散跑失。到10月中旬天气较凉,羊群开始每天进入哈萨,此时哈萨则起到保暖防风、防雪的作用”^①,转场之时可装车带走。日本人类学家鸟居君子曾见翁牛特一带蒙人“车上转载着用柳条编织的大大的圆形羊圈”^②,即此种简易棚圈。又如在锡林郭勒草原一带的阿巴嘎旗在晚清民国时期“仅有柳笆围的畜圈,有的是用羊粪砖垒半圆形圈。用柳条编的‘奔克’作畜棚”^③,也是十分简易,且可移动的。正因为当地牧区棚圈的简易与可移动,因而其选址与布置也是灵活的,可以根据游牧营地具体情况装卸安置,并与自然地势、牧民毡帐、车辆等相互配合。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包是牧民的生活空间,有时候它也是畜牧生产空间和牲畜居住空间,为保护幼畜过冬,部分牧民会将简易的畜棚布置于蒙古包内用以保育仔畜,如明代边将萧大亨载蒙人毡房中“散夷仍卧于地,不设床榻,冬气寒肃,即犬与羊,俱蟠绕于卧前,人畜不分也”^④。清人钱良择曾到一蒙古包避雨,见“其中牛羊男妇杂沓而居”^⑤;清人宋大业在锡林郭勒见蒙古包内“小儿与羊同卧”^⑥。俄人柯兹洛夫在赛音诺颜处亦见“羊羔则被蒙古人带到帐篷内,拴在居所的墙边喂养”^⑦。日人新见浩在蒙地亦发现蒙民“非常爱护家畜,常常将家畜留在包内,同家人一块儿居住”^⑧。民国时期马鹤天在游记中载:“驿站包内,一边有牛犊、羊羔六七头,因初生的犊羔怕冷,所以放在包内,近火取暖。牛粪、羊尿,满地淋漓,我即睡在旁边,用绳和布隔开”^⑨,云耀在达尔罕旗牧区亦见牧民“包中十分杂乱,就连小牛及羊羔等,亦都在包内一东或一西地圈养着喂饮着,绝无炕上和地下之分别”^⑩等。多数牧民在蒙古包内甚至长期设有专门位置“作养牛羊幼儿之处”^⑪,以在冬春天寒之际保育羔羊。法国学者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莫斯(Marcel Mauss)曾指出,“动物、人以及非生命体的对应关系,起初几乎总是被构想为相互最完满地统一起来的”^⑫,上述蒙古游牧社会中人、畜居所联系的紧密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在牧民的思想文化中,并无严格的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之分,人与牲畜共享同一环境。

(二)牲畜棚圈的材质与利用

纯牧区畜圈材料的选择主要与其所处环境密切结合,而且便于游牧移动。柳条和树枝等木制材料是畜圈建设的重要材料,其不仅容易寻找和编制羊圈,而且也便于装卸和移动,因而内蒙古纯牧区的移动式“哈萨”有较多是利用不同木制材料编制的,而这也需与不同牧区的环境资源密切结合。如大兴安岭南端翁牛特旗、阿鲁科尔沁旗、扎鲁特旗等牧区的畜圈多用柳条制作^⑬,而在大兴安岭北部呼伦贝尔牧区内,新巴尔虎地区用柳条制的哈那围造畜圈,鄂温克旗、陈巴尔虎旗等地则用桦木或杨木做的哈木嘎

①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第159页。

② [日]鸟居君子:《从土俗学上看蒙古》,赛音朝格图、娜拉译,第62页。

③ 那木吉主编:《阿巴嘎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④ [明]萧大亨:《北虏风俗》,广文书局,1972年,第14页。

⑤ [清]钱良择:《出塞纪略》,毕奥南主编:《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⑥ [清]宋大业:《北征日记》,毕奥南主编:《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第100页。

⑦ [俄]П·К·柯兹洛夫:《蒙古和喀木》,丁淑琴、韩莉、齐哲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⑧ [日]新见浩:《内蒙风土记》,乔介林译,《长城》1936年第2卷2期。

⑨ 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范子烨整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⑩ 云耀:《达尔罕旗所见所闻》,《新蒙半月刊》1948年第4卷第8期。

⑪ [日]北条太洋:《热河》,李红权、朱宪主编:《近代蒙古文献大系·概览卷》(第四册),中华书局,2018年,第1778页。

⑫ [法]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页。

⑬ 参见[日]鸟居君子:《从土俗学上看蒙古》,赛音朝格图、娜拉译,第62页。関東都督府民政部:《滿蒙調査復命書 第拾卷》(1918年9月30日),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A06033515100。

(栅栏)来搭建畜圈^①。除木制材料外,畜粪也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在牧区棚圈搭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内蒙古东部的翁牛特地区,在用柳条等编制畜圈时,其外表涂有稀牛粪以进行加固^②。在游牧程度较高的锡林郭勒草原牧区,牛粪干片(牛粪与少量泥土加水搅拌后晒干)等畜粪更是直接的建房、建圈材料,如阿巴嘎旗部分牧民用畜粪垒半圆形畜圈^③,又如西苏尼特王府一带除土、木建造的棚圈外,也有不少畜粪和土混合搭建的畜圈^④。梅棹忠夫在锡林郭勒牧区考察时,曾多次发现部分牧民的冬营地有长期固定的羊粪圈,即使在沙丘地带也有不少羊粪圈的存在^⑤。而在没有搭建封闭式的畜圈时,不少牧民也会用畜粪垒防风墙来帮助牲畜抵御冬季寒风。值得注意的是,畜粪圈与木质圈有所不同,其具有一定的固定性,而且往往建在冬营地用于牲畜御寒,且年复一年不停积累的畜粪使其更加坚固,防风能力也逐年增加,在气候、牧草及社会生产条件稳定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的畜粪圈甚至能被几代人使用。每年人畜逐水草转移,而这些粪圈仍多留在原地,故一些赴蒙地考察或经商的人可以常在草原上看到这些貌似无主的空畜粪圈,如张纯初在蒙古牧区曾见“蒙古人拿拾来之粪,打成粪砖,面积约二方尺,厚约四寸,砌成很大的围墙,好像大家的坟墓上的墙垣,墙内放些草料”^⑥,这也为旅人间接提供了燃料。

粪圈的相对固定性与游牧生产移动性并不矛盾,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指出:“在草原游牧经济中,移动性与固定性都是内在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资源的固定性,与取得和使用各种资源的特殊方式而造成的移动性,以不同的比例成分组合在一起。”^⑦因此,游牧生产的特点虽然带有移动性质,但它并不排斥也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特别是在诸如春冬寒冷与夏季暑热时节,需要稳定的、有充足牧草和水源的、可以御寒或避暑的四季及两季营地,这些营地在正常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一般是相对固定的地域,可以抽象为一个点。英国学者彼得·阿迪(Peter Adey)指出,在游牧移动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点,但“每一个点仅是一个‘接力点’而且只是为了‘接力’而存在。因此这个路径或运动不受点的支配,而是具备自主权和自身的方向。从点到点的游牧是必然需要的,而非目的”^⑧,而这些季节性营地就是游牧移动生产中的点,在此建立具有长期性的粪圈,不仅不妨碍游牧移动,而且更能保障游牧生产的进行。除木质材料与畜粪外,纯牧区亦有土圈、石圈等,但数量相对较少。此外,纯牧区畜圈的搭建与管理相比农区与农牧混合区更为简易,一般没有大的清理维护工作,对于畜圈的利用率也相对有限,多集中于对春冬寒风大雪的抵御以及幼畜的保育。圈内产生的畜粪多用于燃料或建材,在生产中,厚积的畜粪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牲畜的“防寒垫”^⑨,但用来施肥或买卖者极少。

结 论

畜圈不但是牲畜的生活空间,体现着自然的属性,更是人为的建筑或工具,是人类生活空间的重要

① 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第159页。

② [日]鸟居君子:《从土俗学上看蒙古》,赛音朝格图、娜拉译,第364-365页。

③ 那木吉主编:《阿巴嘎旗志》,第226页。

④ 興亜院政務部内閣官房総務課:《蒙疆牧業狀況調査》(1941年11月),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6033010900。

⑤ 在梅棹忠夫沿途考察所记录的卡片中,83-66、83-67、83-68、83-69、83-70、83-71、83-72、83-73号卡片均记述了在锡林郭勒草原多地见到的羊粪圈。参见[日]小長谷有紀編:《梅棹忠夫のモンゴル調査:ローマ字カード集》,国立民族学博物館,2014年。

⑥ 张纯初:《外蒙游记》,《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4期。

⑦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⑧ [英]彼得·阿迪:《移动性》,戴奇特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1页。

⑨ 参见 Annika Ericksen, The Limitations of Wintering Away From Customary Pastures in Relation to Dzud in Mongolia's Gobi Region, *Nomadic Peoples*, VOL 24 No.1 (2020), pp.103-104.

组成,体现了内蒙古地区农牧民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与合理利用。内蒙古高原气候多样且多变,春冬季则多有暴风雪灾害,给畜牧生产带来巨大危险,而棚圈则为畜牧生产中应对不利气候的重要利器。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蒙地的大规模放垦,内蒙古逐渐形成了农业区、农牧混合区以及纯牧区的多元经济地域,在此社会背景下,内蒙古东西部广大畜牧生产区的棚圈搭建数量逐渐增多,且不同地域在棚圈的搭建、管理与利用上也逐渐探索出了适应当地畜牧生产环境的多样模式,反映了人、畜与草原环境的多元复杂互动。

在内蒙古东部的农业区及农牧混合区,牲畜棚圈在畜牧生产中的利用较为普遍,在棚圈搭建的选址、布局、材料方面,较多农牧民将畜圈建造于自己固定或半固定的居所附近,有的利用一至三面房屋墙壁或院墙壁,建设依附于房、院的差挂式畜圈,有的则另外在院内或院外附近地区建设独立的棚圈,更有条件的富农或商号,则建设独立的房屋式圈舍。具体样式类型较为多样,长、方、圆形,单开门、双开门者皆有,根据各家畜群数量和实际需求建设。在材料的选用上也较为多元,特别是柳条、树枝、粪坯、土坯,部分地区也有砖石结构的固定式畜圈。在具体利用上,农业区与农牧混合区民众多采用放牧与舍饲结合的模式,因而对于畜圈的利用也不是全天候和全年度的,牲畜主要在冬春寒冷时节或农忙时节(主要是牛、马)才会集中入圈,且由于上述地区有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因而畜圈既是畜牧生产空间,也是积累和发酵肥料的重要农业生产空间。此外,多数民众对于畜圈的管理也较为粗放,卫生、消毒条件不佳。

在内蒙古东部的广大纯牧区,近代以来对于牲畜棚圈的利用也有所增加,牧民多将棚圈建于毡帐周边地区,部分地区牧民会按照牲畜习性和需要照料程度来安排不同畜圈位置和距离。在材料选用上,纯牧区牧民多用柳条、树枝、粪坯、草皮等,部分有条件的牧户也用土坯、砖石等建圈。由于纯牧区仍以转场放牧为主,因而其对棚圈的利用频率也相对有限,管理则更为粗放,棚圈多为临时性的简易棚圈,移动性强,多可以拆卸移动,部分固定粪坯圈虽然可长期利用,但仅集中于冬营地地区,其他季节多处于荒废状态。此外,由于纯牧区的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有一定重合,因而部分幼畜圈直接安置在蒙古包中,且牲畜生存的棚圈空间在牧民的精神世界中亦占有一定地位,具有洁净性、吉祥性和神圣性,是其重要的文化象征。

内蒙古不同地域对棚圈的搭建、利用与管理,反映出不同地域农牧民与牲畜、草原环境的多元互动模式。农区与农牧混合区在棚圈的建造与利用上融入了内地特色,且与农业生产实现集合,固定性、防寒性、耐久性方面均较过去有明显提升。而广大纯牧区畜圈的搭建与利用则仍较为简易和粗放,其多为临时性建筑,更准确地说应是可移动的工具,最大程度地适应了游牧生产生活的需要。且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同一生产类型的不同地域,也因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对棚圈的建造和利用有所差异。棚圈的建设与利用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内蒙古不同地域农牧民对家畜环境的管理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多元互动关系。

(责任编辑:胡文亮)